

中国军控与裁军协会、中核战略规划研究总院近日发布《日本右翼的核野心:对世界和平的严重威胁》研究报告,呼吁国际社会高度警惕日本右翼日益膨胀的核野心。专家对此进行解读。——编者



蔡豪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东北亚研究中心主任

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为代表的日本右翼势力大肆渲染“台湾有事”,并将其界定为日本“存亡危机事态”,进而以应对“危机”为名大幅提高防卫支出,甚至明目张胆放话要修改“无核三原则”。

日本右翼这种刻意渲染外部威胁、不把国家战略重心向军事安全方面倾斜的做法,与二战前的日本军国主义可谓如出一辙。如果不加遏制,不仅会加剧地区军备竞赛,推动核“安全困境”的恶性螺旋持续上升,更将对当今世界来之不易的和平与发展局面构成结构性、颠覆性重大威胁。

### 野心由来已久

日本“无核三原则”指“不制造、不拥有、不运进”核武器。1967年12月,时任日本首相佐藤荣作在国会演说中正式提出这三原则。1971年11月,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通过决议,将它确立为日本政府关于核武器的基本政策。通过这一承诺,日本对内可呼应广岛、长崎受害者及民众的和平诉求,强化“核受害者”叙事,对外既可获得外交与国际形象的“和平名片”,成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无核缔约国的履约标杆,有效提升国际信誉,又可在日美同盟框架下实现安全利益最大化。战后日本所谓“和平国家”的身份构建主要就是由和平宪法、“无核三原则”及“武器出口三原则”共同塑造,佐藤本人也因此获得1974年的诺贝尔和平奖。

然而,日本右翼从来就不隐藏“拥核”意图,甚至在冷战期间便试图用“防御性核武器合宪论”之类主张寻找法理突破口。只是囿于和平宪法的束缚以及国内民众的激烈抵制,这种丑陋、激进的意图要转化为政治决策绝非易事。冷战后,时不时就会听到“日本可以拥核”“日本应该拥核”之类鼓噪声,且声量



▲ 广岛和平纪念馆展示的美国核弹模型  
◀ 日本民众要求高市撤回错误言论

图 IC

越来越大,频次越来越密。到了高市时代,她在就任首相前就明确指出,“无核三原则”与日本安全保障政策有所抵触,应予以修改。出任首相后,她碍于身份不方便明说,便由亲信——首相辅佐官尾上定正宣称“日本应该拥核”,试水温的意图不言而喻。

早在冷战时期,日本便刻意选择可生产反应堆级别钚的核电路径。时至今日,在发展核武器潜力方面,由于日本拥有发达的核电系统和成熟的乏燃料后处理技术,在获取核武器原料方面几乎不存在任何障碍。美国学者塞缪尔斯和肖夫早在2013年就指出,“日本目前的钚储备量已远超任何合理的核电或核武器项目所需数量”,日本实现核突破的可能性“不能被排除”。另一美国武器专家希佩尔则认为,日本的钚储备量“足以制造1000枚核武器”。高市亲信抛出“日本拥核”论调的背后是日本早已属于“核门槛”国家,因此此言一出立即引发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和谴责。

### “新型军国主义”

将危机叙事作为突破和平体制的工具,在日本历史上反复出现。高市试图以此推动战略重心向军事安全方面倾斜,甚至欲修改“无核三原则”,逻辑与二战前日本军部利用“危机情绪”强化军权的模式高度相似——先制造恐惧,再以恐惧为依据推动政策变化,使民众被动接受本来难以接受的军事化举措。

“新型军国主义”虽然不再是赤裸裸的军

事侵略扩张,但国家主义、军事至上、极端排外主义与传统军国主义的思想内核高度契合。而这些思想特征及风格特质,在高市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与抛出“日本拥核”论调表里一致的是,高市及其背后的极右翼保守势力一贯宣扬错误二战史观,坚持参拜靖国神社,竭力为军国主义招魂,企图修改和平宪法,欲彻底摆脱战后体制和战败国身份的束缚。一言以蔽之,日本右翼就是要将支撑战后日本发展的和平路线彻底抛弃,转而将日本拉入“新型军国主义”深渊。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新型军国主义”的叙事逻辑中,为有效地将各种战略冒险“漂白”,便将中国视为刻意“抹黑”的对象,而为了更有效地遏压中国,往往热衷于在台湾问题上制造话题。可以说,和平宪法确立的“专守防卫”原则,正被日本右翼势力披着“国家安全”“自卫行动”等外衣,在持续“漂白”过程中不断突破,包括推进修订“安保三文件”、大幅增加防卫费、大力发展进攻性军事力量等。“日本拥核”论调则是日本加速推进“再军事化”动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 危害世界和平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拥有核武器都不会让日本变得更安全,反而会得不偿失:首先,日本拥核会严重恶化日本外向型经济赖以发展的外部战略环境,进而在政治、经济和外交上付出难以估量的代价。其次,日本拥核势

必在地区引发巨大的核态势升级,反过来会增加日本未来遭受核攻击的风险。最后,作为一个人口稠密且缺乏战略纵深的岛国,日本在面临核攻击时的脆弱性是不言自明的,而承受上述代价的终将又是广大民众。因此日本前首相石破茂才会明确指出,拥有核武器“对日本来说绝不是一件有利的事情”。

作为二战主要策源地之一,日本在战后回归国际社会的合法性,完全系于对《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及和平宪法的严格遵守,而“新型军国主义”倾向显然正系统性地拆解上述法制框架,明显背离日本战后赖以立足的“和平叙事”。

此外,围绕《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已形成一套公认的国际防扩散体系,日本拥核不仅是对这一体系的破坏,也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根本性冲击。其结果必然是亚太战略平衡被彻底打破,军事同盟网络在地区迅速集聚,陷入互竞式军备扩张的安全困境与阵营对抗的危险轨道之中,地区长期积累的合作红利与和平局面也会迅速消耗殆尽。

对此,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所有不希望悲剧重演的人民都绝不答应。为坚决捍卫用鲜血换来的二战胜利成果,有效维护来之不易的和平稳定,中国积极呼吁国际社会高度警惕日本右翼势力日益膨胀的核野心和日本军国主义复辟的危险动向,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避免地区安全环境被进一步推向对抗与失控。



## 加拿大总理访华寻求对外关系“理性回归”



徐晏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  
经济政治研究所  
助理研究员

加拿大总理卡尼14日至17日专程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这是自2017年特鲁多访华以来,加拿大总理时隔八年再次踏上中国土地。

值得注意的是,中加关系在过去八年间历经剧烈波动,卡尼此访更是发生在国际格局显著震荡之际:美国特朗普政府公开宣示对西半球的主导地位,推行激进的贸易保护主义,并屡次表现出对国际法与主权原则的蔑视。在这一大背景下,卡尼访华便多了一层特殊意义。这不仅是一次修复关系的破冰之旅,更是美国盟友在地缘政治夹缝中寻求战略自主的“理性回归”。

### 关系经历剧烈波动

即便是英法德等美国的其他西方盟友同中国的关系,也没有像加拿大同中国的关系那样,在过去几年里经历剧烈波动。

2017年时任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访华时,中加双方还在探讨自由贸易协定的可能性。然而,随着特朗普第一个总统任期奉行对华遏制和强迫盟国“选边站”的战略,尤其是加拿大在中美博弈中扮演了为美国火中取栗的帮凶角色,这一进程在2018年戛然而止。中加双边互信因此严重受损,中国也对加拿大外交自主性产生质疑。此后中加关系虽然略有回暖,但裂痕依旧。

在经济领域,加拿大延续“政治站队”逻辑,追随美国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100%关税,对钢铁和铝产品征收25%进口税,迅速引发中国反制。但如此站队并未给加拿大带来预期的政治或经济回报,加拿大不仅

失去了重要的中国市场,本国农业省份也受到冲击,汽车产业更是在美国关税与产业补贴调整中陷入更为尴尬的境地。而伴随美国政策变化,斯特兰蒂斯等车企回迁至美国本土,加拿大制造业也加速外流。

### 两大因素促加反思

卡尼此访的更深层背景,是加拿大对外交与经济战略的系统性反思。过去一年,加拿大政商界逐渐意识到,过度依附单一超级大国带来了实质性的“外交窒息”。

这一教训首先来自美国的“不可靠性”。特朗普重返白宫后,加拿大的战略不安全感迅速加剧。仅因加拿大安全广播播放了一则引用美国前总统里根批评关税危害的电视广告,特朗普便在五个月内第二次单方面中止贸易谈判。加拿大一度以为,只要在对华政策上配合美国,便可换取《美墨加协定》框架下的稳定与豁免,但现实打破了幻想。

其次是错失的“中国机遇”。在中加关系停滞的几年中,全球产业格局发生深刻变化,中国凭借全球最大最完整的新能源产业链以及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在电动汽车、电池等领域取得全球领先地位。加拿大试图以高关税将中国电动车拒之门外,不仅未换来本土产业腾飞,反而因市场和资本不足,在清洁能源与相关技术领域逐渐失速。越来越多加拿大有识之士意识到,问题不在于如何挡住中国,而在于如何在竞争中学习成功经验,通过合作弥补自身短板。

### 敞开务实合作之门

中国始终将加拿大视为具有潜力的合作伙伴,即便在双边关系最低谷时期,中国仍是加拿大第二大贸易伙伴。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中加在资源禀赋与经济结构上高度互补,应从共同的长远利益出发推进双边关系。中国很清楚,基于地缘政治与外交传统,加拿大必然是美国最亲密的

盟友之一,但这并不意味着加拿大只能扮演附庸角色。作为七国集团成员国,加拿大若能在对华政策上展现更强的独立性与务实性,便能为中国与其他西方盟友的互动提供可复制的范式。中国在对加拿大对等反制中的目标,也并非展示力量,而是促使对方重新回到基于规则、利益与对话的轨道。

因此,此次元首外交并非象征性的姿态,而是期待构建具备可操作性的合作框架。如在关税问题上作有益调整,建立更清晰的贸易争端解决机制,在低政治敏感度领域如绿色技术、金融合作、旅游与教育交流等方面加强社会层面的联系。

当然,卡尼此行注定不会轻松。加拿大国内仍然存在的质疑、美国的审视、中加关系中尚未完全消融的不信任,都是现实挑战。但中加在承认分歧的前提下重启合作的尝试,或许能为当下高度动荡的国际体系提供一种更具现实意义的相处模式。